

治西洋史經驗談—陳正國教授訪問記錄

受訪者：陳正國教授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副研究員）

採訪與撰稿：歷史系碩士班二年級劉得佑同學

【編按】

陳正國教授為英國愛丁堡大學歷史學博士，時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。陳教授主要的研究方向為 18 世紀的「蘇格蘭啟蒙」問題，以及先進啟蒙國家與後進啟蒙國家之間的比較研究，並以中、英文發表許多專著、書評，對學界的貢獻卓著。做為一位優秀的西洋史學者，陳教授是如何對西洋史研究與啟蒙相關議題產生興趣的？就讓《臺師大歷史系電子報》透過這次面對面的訪談，帶您一起了解陳正國教授的學思歷程。

Q1：

相較於治中國史與台灣史者，台灣史學界對於西洋史的研究較少。所以很好奇的是，陳教授對於西洋史的關注是從何時開始的？是因為讀了某本書，還是因為選修某堂課程所產生的興趣？

A: 我對於西方社會或西方知識的興趣是很早的，比較明顯是在大學的時候。但當時我對西洋史本身並沒有特別的興趣，反而較關注於西方社會與西方知識的問題，因為在我們那個年代，社會學是很多同學關心且興趣濃厚的。而我真正對於西洋史研究產生興趣是較為晚期的事，主要是因為在就讀研究所期間，我報名並考上教育部的公費留考，所以才開始比較專注、認真地去研究與學習西洋史。

而在我就讀大學期間，輔大歷史系西洋史與中國史的師資比例、要求修習的學分數都是一比一，所以我修了很多西洋史的課這是事實，但並沒有特別喜歡西洋史。相對而言，那時候比較吸引我的反而是中國史，我最有興趣的是秦漢到魏晉，還有中國近現代。對於這兩個斷代的興趣是產生於中學時期，但後來因為公費留考的關係，我並沒有在這兩方面從事特別專業的研究，反而進入了西洋史的世界。

不過對於走上西洋史研究的道路，我認為還是有跡可循的。在我求學的 1970-80 年代，那是一個相當變動的時期，這個變動指的是一種運動方向，也就是所謂的現代化，尤其是認識社會方式的現代化。在這種情況之下，很必然的，我們對於西方社會的性質開始產生興趣，並嘗試進行探索。所以誠如我剛剛所言，在 1970-80 年代的台灣社會，對於西方社會學、哲學與政治學等學科的興趣十分濃厚，甚至超過史學，且這些西方學術對於當時個人的知識探索、訓練而言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。

但當時我們對於社會學的關注，主要是集中在古典社會學而非現代化理論，如韋伯、馬克思、涂爾幹等人的著作，尤其是馬克思和韋伯，在台灣的影响力是

很大的。同時也因為這樣，我開始接觸到一點點的歷史學，因為我認為這些社會學家在某個意義方面而言也是歷史學家。歷史研究在古典的意義上，跟今天稍有不同，古典的歷史學研究專注於較大的社會變遷，也就是所謂的 Great transformation，因此它跟古典社會學之間的對話性非常高、非常強，關心的層面亦有許多重疊，只是在態度上跟方法上會略有不同。所以，可以這麼說，我會走上歷史研究，尤其是西洋史的研究，甚至是我現在關心的研究主題，都跟古典社會學有十分密切的關係。

Q2：

從陳教授的簡歷當中可以知道，教授是英國愛丁堡大學的歷史學博士，那您在求學的歷程中有沒有一些特別深刻的回憶或經驗？還有在這個過程中有沒有碰到一些挑戰，如果有，是如何去克服的呢？

A:

每一個人的經驗都不一樣，A 的經驗對於 B 來說不一定特別有效或有意義，不過還是有一些結構上的東西是大同小異的，例如語言。在外地求學時，整個語言環境是改變的，在英語世界你就要用英語閱讀、書寫，這當然很困難，如我個人的興趣是思想史，思想史對於英文的要求不僅僅是一般口語的程度，它的細緻度要更高，對當時的我來說是最大的挑戰。

不過話說回來，我覺得我們可以做的就是盡我們能力，做我們能做的，這樣而已。而且我也不覺得現在的我克服了語言的挑戰，因為如果是學習外國語言，這種障礙是一輩子的，沒有所謂克服的一天。如果有可以被稱為是克服的過程，大概就是你寫的東西從沒人看得懂，到有人看得懂，再到有人說還可以，這種慢慢改變的歷程。而這樣的歷程對我而言，我不認為這是一種挫折，因為我知道它是必然存在的，我會告訴自己：「做就對了！」。

相較於語言，我覺得跟老師之間的互動，對我而言是比較能被稱之為挫折的東西，但我想這個不是因為在國外，而是全世界都會有的情況。在台灣，我們找指導教授時，基本上是對這位老師是熟悉的，知道其習性、個性與學術傾向，因此我們會很清楚為什麼選擇這位指導老師。但在國外，這些前提都是不存在的，我們對於老師很陌生，所以我們要常常跟老師的基本性格、學術觀點作對話、磨合，這需要一點時間。在我年輕的時候，我以為這點跟學術本身無關，但這確實是個具體、現實且需要克服的問題。而有些問題是我們可以掌握的，例如英文程度不好，可以每天多花兩小時來改進，這是可以掌握的。但你跟指導老師之間的關係，這不是你能掌握的，需要多一點時間去摸索。

在英語世界裡，指導教授會是你第一個或是你最重要的讀者，我們寫東西需要專業的讀者認可，指導教授就是第一位。所以，這部分對我來說是一種重新的體驗與學習。因為在台灣，師生的關係比較自在，但在英國卻不是如此，英國師生之間的關係非常非常密切，如果師生之間關係疏遠反而是出了問題。因此，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學習與體驗。

Q3：

據陳教授於史語所網頁上的簡介中可以知道，陳教授十分關注蘇格蘭啟蒙與西方現代性開展的議題。想請問陳教授是在什麼時後產生對於該議題的興趣與關注呢？

A:

這個問題其實很單純，主要是我的英文比德文、法文好，如果要做歐陸啟蒙的話，我的德文與法文還不夠好。因為受限於語言，我比較能夠處理英國啟蒙的問題，這是最基本的原因。不過還有一個原因是，在台灣大家都讀英文，卻沒有一個人好好研究英語世界的啟蒙問題。雖然我們從小學一年級、二年級就會讀英文，可是現在台灣有人研究美國啟蒙嗎？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。

上述的原因雖然很單純，但我還是相信在選擇研究題目時，仍然存在某種程度的偶然性與必然性。必然性是指，當你選擇一個博士論文題目時，你已經到 25 歲左右，20 年來你的世界觀、你被影響的東西，已累積到一定程度，你會選擇什麼題目基本上已定型。除此之外，你也透過這段時間，認識到自己的長、短處，不能做的題目就是不能做，這就是我所謂的必然性。以我的經驗來說，英文就是一種必然性，因為要在短時間內，重新學習一種語言並拿到博士學位，這是很困難的。

同樣地，我也認為在選擇題目時，應該從自身的「限制」出發而非「可能」，去思考問題。因為可能是無窮的，我們要好好看我們的限制是什麼。以我自己的例子而言，我的限制就是英文。但我所謂的限制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層面的意義，即我們的知識積累在選擇題目時已經定型，這也會影響到自身的選題。

我對於蘇格蘭啟蒙的關注起源於 1990 年，這個議題對當時的我而言是一個新發現，就我所知，那個年代的台灣，討論蘇格蘭啟蒙的人還非常少。選擇這個题目的原因，主要還是因為我拿到公費，要出國去念書。但我的西洋史知識，卻不足以讓我選擇一個適合的論文題目，因為我所知道的都是常識，如法國大革命。

至於為什麼會發現這個題目，是與你(我)們所熟知的一個歷史人物有關，即亞當·史密斯(Adam Smith)。因為他是我印象最深刻，有興趣，且又是英語世界中的重要人物。但說實話，在 1990 年代，我們對於他的了解十分有限，當時沒有一本教科書告訴你他是哪裡出生的。對於研究歷史的人來說，你研究一個人，不知道他是哪裡出生的，等於是沒有這個知識。除此之外，「蘇格蘭」的概念亦很少出現在課本中。所以，「蘇格蘭啟蒙」這個詞對我本身來說是一種發現。

那我是怎麼發現的呢？因為我熟的是亞當史密斯，所以我開始去圖書館查閱相關的資料，在閱讀的過程中，我才驚訝地發現有一個詞叫做「蘇格蘭啟蒙」。當下我就決定要做，除了因為這是一個新發現之外，還著眼於它的重要性。因為一個像蘇格蘭那麼小的社會，僅僅有 100 萬人口，卻能在短短幾十年內出現那麼多重要的人物。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時空，什麼樣的現象，會創造出這些人？我並

不覺得他們特別偉大、聰明，因為我認為每一個時代都有聰明的人。但我比較好奇的是，為什麼當時他們會花那麼多的時間、專注力去探討經濟秩序、法律秩序、道德秩序、社會秩序、政治秩序或者是宗教秩序的問題，這剛好是我有興趣的。我一開始說過，我的知識興趣是與社會學密切相關的，在我看來，亞當史密斯在某種層面或意義上也是一個社會學家。

舉例來說，亞當史密斯在討論經濟問題時，即是採用「秩序」的觀點，什麼是秩序？秩序就是一種規則，它告訴我們的是一種不變，在這種不變中我們可以進一步發現「變」的意義。因此，變與不變是一種辯證性的關係，要在秩序這個概念裡面才可以去掌握、去了解。所以對我來說，他們所討論的經濟問題(如：市場機制)就是一種對於秩序的探索，也反映出 18 世紀的人對於世界的理解。

Q4：

最後，想請陳教授跟我們分享一下研究西洋史應該具備的基本能力，並以前輩的身份給予學弟妹們一些鼓勵與建議。

A:

我相信師大改變蠻大的，我唸師大研究所的時候，師大大學部就讀研究所的學生比較少，教書的人反而比較多。我覺得師大學生的資質都還不錯，可是學術的企圖心相對於台大、政大而言比較弱，這是事實。但這是以前的條件，現在當然不一樣，以前可以安安心心地去中學教書，現在卻沒有辦法。不過，我覺得文化存在著一種惰性，比較不容易改變，就是一種氣氛在那邊，說不定那個氣氛慢慢在改變，但還沒有完全改變，例如師大學生到別的學校、科系旁聽的情況跟台大比起來還是比較少。可是，這是我非常多年前的印象，說不定今天已經不存在，而這是當時我認為師大唯一需要改變的地方。

至於西洋史研究，我認為它沒有特別的入門，它跟研究中國史是一模一樣的。在台灣主流大學的歷史系裡面，就專業的層面而言，對於一個年輕歷史學者養成的要求，比英語世界高。我的意思是說，如果我們可以研究中國史，我們就可研究西洋史，它的入門是一模一樣的。我們怎麼研究中國史的呢？在研究清代以上的歷史，我們要會讀文言文、要能分析、考證與辨別史料，並找出有意義的問題。除此之外，亦要能跟學者的研究成果對話，撰寫優秀的二手研究回顧，然後加以批評，並就自己所看到的材料建構出一套新的看法，清楚自身研究的學術貢獻。

既然我們是這樣研究中國史的，那研究西洋史也是一樣。但在現實中最大問題是，我們沒有那個條件、花那麼多時間去做西洋史。假設我們的學生生涯可以重新來過，我立志要做一個西洋史的學者，那我會從 15 歲的時候就去學 2-3 種重要的語言，18 歲的時候就開始閱讀重要的史書和一手史料。但如果我們 25 歲 30 歲才決定要走這條路，當然沒有辦法走那麼遠。所以，我們該怎麼做，其實我們都很清楚，只是有沒有那麼多的決心與時間去實踐它而已。